



政府政策制定者, David Halpern

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政策顾问，通过规范的实验和行为洞察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服务

对我来说，关键的收获在于：1）相比于卫生部门，其他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追赶”，才能够在证据的生产、共享和使用的各个方面达到相同水平；2）政府需要一个全球机制来联合委托进行证据综合，这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也能够让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者以高质量和及时的证据产品做出回应；3）需要在政府和专业机构中建立“吸收能力”。在这些问题上，我既热忱又有些急不可待。

关于第一点，我们需要揭露我们在许多领域中证据基础的脆弱性，但更积极地说，当我们建立证据基础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说明了这一点，即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这就确立了我们的**第2条建议**：当有人提出主张时，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注意并询问主张所依据的证据质量及其适用性。要求更好！

谈到第二点，我们需要“冲洗”政府部门应该知道答案但却不知道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确定“建立在沙地上”的政策和实践领域。在英国，我们在称之为“研究兴趣领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当前，政府部门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形成英国研究和创新的研究资助议程（每年80亿英镑），这与我们关于使政府证据支持系统更符合目的**第5条建议**有关。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协作机制，通过生产、综合和分享证据来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称其为全球协作网（扩展了我们在英国已有的协作网），但其他国家可能希望为这个协作网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全球协作网有助于解决现有证据覆盖范围和质量不均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必要重复，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或通过依赖其他国家的投资搭顺风车）。这与我们针对资助者的**第24条建议**有关。

最后一点让我想到了人们认为提供明确政策建议的机构存在的弱点。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尽管有大量的政策和实践，我们仍在黑暗中步履蹒跚。可靠的评估很少见。同时政策制定者又容易过度自信。诸如英国关于设计评估的红皮书和如何评价和评估政策、计划和项目的绿皮书在内的技术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需要更多符合目标的证据支持人员和合作伙伴、科学顾问和政府咨询机构（**第6至8条建议**），以及专业机构的相应改进（**第12条建议**）。建设评估能力（例如英国新建立的评估特别小组）在证据构建的启动和利用方面尤其重要。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我们选择、定期测试，并在国际范围内比较高级政策顾问理解和使用证据的能力。证据委员会的报告将这些想法进行了汇总，并提供了许多如何去做的指导。

